各个重要环节。它所要求的，可以归结为这样两句话：“慎以防滥，慎不失严”。

附带说一下，宽刑之说主要来源于对《吕刑》一处原文的误解。“荒度作刑”是开篇的关键词句。过去就有人把“荒度”解释为宽怀大度，现在仍有持这种看法的。实则，“荒”应训为治；也可训为大。但大不是宽大，而是大有作为，大有成就。《尚书·盖稷》：“启呱呱而泣，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。”这句的“传”和“疏”都把荒解为大治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把“度”训为“估量”：“命甫侯度时作刑”。均可采取。则“荒度作刑”就是省时度势，用大治的精神作刑。这和宽刑是沾不上边的。

有的还把“荒”解为“昏暝”、“恍惚”，说是“年老昏暝，不辨是非”。寻其根源，在这个问题上，《孔传》的解释是值得商榷的。《孔传》把“髦荒”连读，且谓：“穆王享国百年，髦乱荒忽。”《汉书·刑法志》因之，也说：“周道既衰，穆王眊荒”。查《尚书·大禹谟》有一相似用法：“帝曰：格，汝禹，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，髦期，倦于勤，汝惟不怠，撻朕师。”百岁为期，不过说年老倦勤而已，《吕刑》亦同其意。《吕刑》于较大段落开始，也都用“王曰”领起，既言王有明训，又怎能说他“昏乱恍惚”呢？此理甚明，无待深论。

（作者单位：西南政法学院）

责任编辑：余光

明大诰的版本

杨一凡

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至二十年间，先后颁行了冠名为《大诰》的文告四编，即《御制大诰》（十八年十月刊行，本文简称《一编》）、《御制大诰续编》（十九年三月刊行，简称《续编》）、《御制大诰三编》（十九年十二月刊行，简称《三编》）和《大诰武臣》（二十年十二月刊行，简称《武臣》）。四编《大诰》是研究明初法制和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状况及朱元璋法律思想的珍贵文献。此书所述，多为正史及诸野史笔记所未载。清初修《明史》时，《刑法志》的编者因未见及《大诰》原文，对它的条目记述相殊甚远。加之它是由朱元璋直叙当世之事，儒臣们很少润色，故史料的可靠性在一般官修史书之上。

近代以来，明《大诰》曾被人们视为罕见之书，能够方便学者研究利用的版本寥寥无几。直到近二十年间，搜集、流传这一史籍的工作才开始活跃起来。1966年，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、由吴相湘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史学丛书》之一《明朝开国文献》中，首次将《大诰》前三编影印（本文简称《丛书本》）。其书卷首邓嗣禹先生著文说，影印时所据《大诰》一编、续编原本，系“由京师图书馆转至北平图书馆，复迁至美国国会图书馆”，“由吴光清先生之协助，摄制胶片”（此两编原本后转至台北有关图书馆收藏）；《三编》是据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所藏孤本影印。这三编《大诰》系何种刻本，邓未曾提及。依愚见，它

虽较明代洪武内府刻本成书要晚，但属明刻本却是无疑的。至于《武臣》，《丛书》收录一手抄本附于前三编《大诰》之后，据何底本抄录，谁人抄写，编者没有交待。经我初步校勘，丛书本脱落、误、错的有一百三十余处。

继台湾学生书局影印《大诰》后不久，1967年（日本昭和42年），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的《皇明制书》一书中，又收录了四编《大诰》。据山根幸夫先生于该书后所写《皇明制书解题》一文可知，《大诰》一编系据东洋文库所藏明万历七年大名府官本（二十卷本，此书存明初法令典籍十四种，保定巡抚张卤校刊，明善堂旧藏，本文简称东洋文库本）影印，因东洋文库本《皇明制书》仅存《大诰》一编，故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、《武臣》据内阁文库所藏明刻本（不分卷，此书存明初法令典籍十一种，本文简称内阁文库本）影印。我曾对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的《大诰》进行过校勘，发现所据之底本有几处脱页，其中《一编》正文前缺目录，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缺序文，正文中脱落、误、错的达三百一十多处。

上述两种影印本问世，对于明《大诰》的保存、流传和促进对它的研究，是做了件有益的工作。但是，鉴于此两书影印本在我国大陆只收藏有几套，且所用的底本也并非最佳本，为此，在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、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资助和宋国范、曲英杰两同志的协助下，最近两年间，我进行了大诰版本的寻访、研究和点校工作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国大陆能见到的各种《大诰》版本，约有十余种，其中堪称为善本者有：北京图书馆所藏《一编》、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明洪武内府刻本各一卷；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明洪武二十年太原府刻本各一卷；《三编》明初刻本一卷；《武臣》明初刻本一卷。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：《一编》、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、《武臣》明洪武内府刻本各一卷；《续编》明初刻本一卷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：《一编》、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、《武臣》明洪武内府刻本各一卷。此外，东北师大图书馆藏有《一编》、《续编》明刻本（白口四周单边，每页10行，每行16字，小字15行11字）各一卷，北京图书馆藏有《武臣》皇明制书本（白口四周双边，每页8行，每行18字，明刻本，目录后正文前有《救谕武臣》一文）一卷。在以上诸版本中，洪武内府刻本是印行时间最早、错误最少的善本。特别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洪武内府刻本，文字清晰，没有缺页，脱落处很少，又无后人妄改之弊，为诸本之最。

北京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三个洪武内府刻本，均为黑口四周双边，每页10行，每行20字，版面的编排形式，文字的行距和每行的首尾两字，字体及其大小，没有差异。几处脱漏的文字也一样。如，《续编·查踏水灾第八十四》首行均脱“询问民瘼，有等父母善教”10字，《三编·进士监生不悛第二》向宝条下，“一次为水灾受钞五百六十七贯五百文”句均脱“一”字等。然精心校勘三书，可发现它们虽同为洪武内府刻本，也有几处相异的地方（底本系清华大学藏本，省略不标出）。如《一编》2页5行“视吏卒如奴仆”句，故宫藏本作“视躬而如主仆”。《续编》首行“好闲无功”句，北图、故宫藏本作“好闲无功”；17页下1行“点视盘诘”句，北图、故宫藏本作“点视大诰”；21页下2行“屈指知其有无”句，北图、故宫藏本作“屈指知其赏无”。《三编》55页下6行：“语既”，北图、故宫藏本作“语默”；75页上8行：“亲兄许昂”，北图、故宫藏本作“亲况许昂”。《武臣》11页上9行“神天如何容得他”句，“神天”，故宫藏本作“神明”等。此外，北京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洪武内府刻本还有一些脱落和后人涂改之处，不再赘举。

三个洪武内府刻本对勘的结果表明：（1）《一编》实为两种不同的版本，即北图和清华

大学藏本为同一刻本。故宫藏本属另一刻本。(2)北图和故宫所藏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，文字上并无差异，大抵属同一刻本；而清华大学所藏此两编应属另一刻本；(3)故宫和清华大学所藏《武臣》，也不是一种刻本。

为何同是洪武年间内府所刻而出现两种不同的版本呢？我想可能是下述原因所致：即《大诰》作为法定的、要求“家传人诵”的御制圣书，印数极大，难免要连年印刷，这样，再版重印时就可能会对前一种版本中的个别文字稍加厘正，同时，各地官府在翻印时也会发生偶然的失错。关于洪武年间《大诰》不止一次刊印的记载，在《大诰续编后序》中曾经提及：“诰行既久，近监察御史丘野奏，所在翻刻印行者，字多讹舛，文不可读。欲穷治而罪之，朕念民愚者多，况所颁二诰字微划细，传刻之际，是致差讹。今特命中书大书，重刻颁行，使所在有司，就将此本，易於翻刻，免致传写之误。敢有仍前故意差讹，定拿所司提调及刊写者，人各治以重罪”。这段文字说明，不仅当时各地官府、民间曾传刻《大诰》，就是中央机构也起码两次刻印过《大诰》前两编。因当时刊刻《大诰》之事在朝廷由内府负责，所以，同为洪武刻本或洪武内府刻本，出现不同的版本是可以理解的。

以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洪武内府刻本为底本，与现存的各种《大诰》版本相校勘，可见各版本之优劣：

(1)在诸《大诰》版本中，脱、讹、衍、倒、误文字较多者，依次为内阁文库本、东洋文库本、丛书本、北图藏《武臣》皇明制书本和《三编》明初刻本。现将以上五种版本脱、讹、衍、倒、误的处数列表于后：

编目 \ 版本	内阁文库本	东洋文库本 (只存一编)	丛书本	北图藏皇明 制书本 (只存《武臣》)	北图藏 明初刻本 (三编)
一编	42	114	63		
续编	87		35		
三编	76		6		15
武臣	33		31	37	

(2)就成书时间早而错误较少的版本而论，除清华、故宫、北图所藏洪武内府刻本外，尚有北京图书馆所藏《武臣》明初刻本。此刻本为黑口四周双边，每页10行，每行20字，书尾附《大诰后序》，同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洪武内府刻本校对，无讹脱文字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善本。

另外，北京图书馆还藏有《续编》、《三编》洪武二十年太原府刻本残卷。书尾详记提调翻刻、对读校正官员名单和刻字匠姓名，是我国现存《大诰》版本中最早的刻本之一。在当今《大诰》洪武刻本已很罕见的情况下，它的史料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。

(作者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)

责任编辑：余光